



王好是我国著名的女导演,曾执导过《瞧这一家子》《潜网》《夕照街》《迷人的乐队》等影片,还和铁凝合作拍摄过《村路带我回家》《哦,香雪》。她的电影关注现实题材,又有着女性的细腻和诗意,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。她很喜欢孙犁的作品,一直想拍《荷花淀》,先后找了四五个人写剧本,但都不满意,觉得没有写出那种诗意的东西。转眼到了1994年下半年,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,她还是想把《荷花淀》搬上银幕。铁凝向她建议,不妨找汪曾祺改编剧本。

孙犁和汪曾祺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。孙犁是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出来的革命作家,汪曾祺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系,被称作“革命时代的土大夫”。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,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却有颇多相近之处,他们都是文人大家,都在打通小说、散文和诗歌方面,作出了不懈努力。他们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抒情意味,都把描写风景美、人情美和人性美,作为自己的文学追求。

汪曾祺不仅是著名作家,还是北京京剧院的编剧,是一位戏剧创作方面的行家里手。他创作的京剧剧本主要有《范进中举》《雪花飘》《裘盛戎》,还有抒情戏《小翠》,戏剧歌舞剧《大劈棺》,而其中最著名且最为人津津乐道的,当然是根据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编,与杨毓珉等人合作创作的京剧剧本《沙家浜》。因此,若要改编孙犁的作品,汪曾祺是十分理想的人选。

王好并不认识汪曾祺,先是电话联系,自报家门,询问他对改编孙犁的小说是否感兴趣。汪曾祺说,可以谈谈。于是,王好为登门拜访。在漫谈中,两人相互探讨,发现彼此的艺术趣味和创作理念十分吻合。汪曾祺表示,关于改编之事,要等他看完孙犁的作品后再做决定。

对于孙犁,汪曾祺一直十分敬仰,他曾表示:中国让他服气的小说家只有鲁迅、沈从文、孙犁三人。对于汪曾祺的创作,孙犁很早就予以关注。1984年4月,孙犁在《小说杂谈》一文中,曾对一些文学作品予以点评,第一小节点评的是莫言发表在《莲池》上的《民间音乐》,第五小节点评的便是汪曾祺的《故里三陈》,直言“我很喜欢这样的小说,省时省力,而得到的享受,得到的东西并不少”。他认为,汪曾祺的小说是传统的传统写法,“它好像是纪事,其实是小说”,并把自己的小说(《芸斋小说》)与之进行比较:“我晚年所作小说,多用真人真事,真见闻,真感情。平铺直叙,从无意编故事,造情节。但我这种小说,却是纪事,不是小说。强加小说之名,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。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。”其实,汪曾祺的小说也大都有真实原型,虚构的成分也不多。他们的小说都继承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精髓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两个月后,王好为再次登门拜访。汪曾祺告诉她,电影的片名已经想好,就叫《炮火中的荷花》,并初步选定孙犁的六七篇小说进行改编,力求凸显残酷战争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。王好为十分兴奋,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

真正进入到改编阶段,汪曾祺才深切感受到,孙犁那种散文化的诗意小说,改编起来难度有多大。汪曾祺自己的作品也没多少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,他亦不善此道。1954年,他创作了京剧剧本《范进中举》,一次酒后,老舍和他开玩笑,说他的剧本“没戏”,即缺少戏剧性,而他和孙犁的文学风格相近,好处是容易入手,难处是结构剧情不易。

正在这时,汪曾祺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,饭吃得很少,笔也懒得拿,整天枯坐在沙发上,颇有力不从心之感。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,便给王好为打电话说:“不行了,写不了。”他说,自己没有战斗生活,对冀中地区的语言不大熟悉,对如何结构电影剧本也没有经验,改不下去。放下电话,王好为立刻登门来见他。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说,“无奈王好为很会做工作,一再说他们想搞一个与众不同的战争题材的电影,孙犁的小说很切合他们的设想,而孙犁的作品只有让爸爸改编才能不失其韵味。让她这么一谈,好像爸爸不动笔,就无法把孙犁的精品搬上银幕了。这个责任非同小可。于是,爸爸只好打起精神,勉为其难了……看到他整日冥思苦想、茶饭不香的样子,我们都劝他不要写了,年纪那么大,身体又不好,没本钱玩命了。爸爸也几次都说过洗手不干,但是碍于情面,最后还是咬牙把剧本写成了。”

1995年初,汪曾祺因肝病和小肠疝气住院,王好为到医院看望,她对《炮火中的荷花》剧本十分赞赏,认为写得“太精彩了,太富有诗味了”,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。当时,汪曾祺正准备做手术(后来实施),无法动笔。王好为征得他的同意,自己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和内容上的增删,修改后的剧本发表在《电影创作》1995年第4期上。在中宣部文艺局、广电部电影局的推动下,河北电影制片厂、中影公司影视制片部准备联合拍摄这部电影,后由于资金问题难以解决,拍摄计划流产。

二

其实,最早改编《荷花淀》等作品的正是孙犁自己。1949年,在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的鼓动下,他曾写过一个电影脚本。抗日战争时期,孙犁和凌子风相识于冀中,又一同从延安返回张家口,是生死与共的战友。进城后,凌子风想拍一个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电影,孙犁正值青年,乐于尝试新鲜事物,便把自己的一些小说和散文重新编排一下,搞出了一个电影脚本。

过了很长时间,凌子风写信告诉他,电影脚本送给茅盾审阅,同意了,转到周扬手里,否定了,说是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居多,还是另拍一部小说为好。孙犁不大同意这一意见,心中不平,却也没有申辩,只是把脚本中新写的部分摘出来,改成短篇小说《采蒲台》,拿出来发表了,从此不再“触电”。至于那个电影脚本,先是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,发还后,被孙犁生了炉火。现在,人们只能从《采蒲台》中略窥其貌。

汪曾祺创作的《炮火中的荷花》共八小节,把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《光荣》《山地回忆》《吴召儿》《嘱咐》等几个短篇小说融为一体,创作出了一部带有浓厚抒情风格的电影文学剧本。

第一小节十分唯美:白洋淀上缓缓展开花瓣的粉红色荷花、满眼随波荡漾的荷叶、飞驰在绿荷丛中的小船、精瘦的老渔翁那双尖锐明亮的眼睛,还有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……这一切,都呈现着白洋淀特有的风景美和人民抗日斗争的精神风貌。

第二小节是对《荷花淀》的改写。水生参加了区游击队,与媳妇夜话别;水生媳妇和村里几位青年妇女追寻自己的丈夫,在大淀遇险,并亲眼目睹了游击队伏击日本大船的战斗场面。回村后,她们苦练射击,驾驶着小船和水床,出入芦苇荡,配合游击队打击日本鬼子。

第三小节根据《芦花荡》改写。月夜的水淀上,那位精瘦的老渔翁送两个女孩子——大菱和二菱到芦苇荡中去,中途遇到日本鬼子的小火轮,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,大菱受伤。第二天中午,老渔翁把正在淀中洗澡的鬼子,引诱到自己布下的鱼钩阵中,鱼钩钩住了鬼子的大腿,老渔翁举起竹篙,砸在敌人的头上。

第四小节撷取了《光荣》的前半部分进行改写。在秀梅的配合下,十几岁的原生女鬼子的一支步枪,参加了游击队。他的媳妇小五是个落后分子,对原生参加游击队心怀不满,秀梅和水生媳妇对她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。

第五小节把《山地回忆》和《吴召儿》糅合在一起改编。一位八路军干部在河边洗脸,和在下游洗菜的女孩子发生了争吵,这个女孩子就是吴召儿。这年冬季,八路军反“扫荡”,那位八路军干部担任了一个游击队的组长,分配给他的向导就是吴召儿。吴召儿带领游击队

小组在大山里辗转游击,和敌人进行战斗。

第六小节改编自《嘱咐》。水生回乡看望妻儿,只住了一宿就要返回部队。凌晨,水生媳妇撑着冰床把丈夫送上了前线。

第七小节是改编者创作的一段过渡性文字。大菱、二菱坐着老渔翁的小船到苇塘去,因为这里的自卫工作搞得很好,区长让她们来学习和取经。

第八小节根据《光荣》的后半部分改编。水生媳妇、吴召儿、双眉还有秀梅,看到刚从娘家回来的小五,便又开始做她的工作,告诉她,原生去当兵,为的是保家卫国,是光荣的事。小五反驳她们:“光荣值几个钱!”她执意要和原生离婚。小五离开婆家后,秀梅经常到原生家去做活儿,照顾原生的父母。原生在前线立了大功,骑着大马荣归乡里,村里召开了庆功大会,秀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。

剧本的结尾展现了原生和秀梅这对青梅竹马的年轻人的爱情。画面闪回到秀梅和原生生枪的场面。奔跑中,秀梅的头巾丢了,他们跑回去找那块头巾。找到的头巾随风飘起来,变成了展翅飞翔的白鹭……

三

汪曾祺创作的这个电影文学剧本,较好地反映了孙犁的文学风格和审美追求,是一部难得的成功之作。但是,由于创作时间仓促,加之汪曾祺青少年时代主要生活在南方,对白洋淀地区和晋察冀的抗日斗争,包括地理环境、风土人情了解不深,在创作上也就难免存在一些瑕疵。比如,第五小节的八路军反“扫荡”,吴召儿带领以“干部”为组长的游击队转战山地,与白洋淀水乡的抗日斗争缺乏内在联系,本来是水乡之笔,一下子写到山里去了。这一节,如果让从白洋淀走出的水生替代那位八路军干部,让他转战到晋察冀山区,或许更加合情合理,从人物塑造来讲,能充分彰显水生这位青年农民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抗日英雄的历程,而从剧情来讲,也与第六小节的水生返乡之旅形成一个完整链条。

另外,为了增加这个电影脚本的容量,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把孙犁创作于1942年8月的短篇小说《爹娘留下琴和箫》融入进去,与《芦花荡》进行衔接。

《爹娘留下琴和箫》描写了钱智修和妻子参加抗战的故事。钱智修和“我”是好友,喜欢拉南胡,和一位善于吹竹箫的姑娘结婚,后来生下了大菱和二菱两个女儿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钱智修参加了游击队,在一次战斗中牺牲。妻子把大菱和南胡交给“我”照顾,自己带着二菱和竹箫参加了抗战。不久,她要到延安去,又把二菱和竹箫送来。过了一段时间,“我”要到别处去工作,只好把两个孩子送回她们的姥爷家。在“五一大扫荡”中,“我”来到了白洋淀,从摆渡的老艄公嘴里,听到了两个女孩子在穿越白洋淀时,被敌人射杀的故事。“我”不能确定那两个女孩子就是大菱和二菱。在那满天芦苇形成的巨大帐幕下,“我”仿佛看见两个穿军装的女孩子走出来,一个拉南胡,一个吹竹箫……

《爹娘留下琴和箫》是孙犁第一篇描写白洋淀地区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,作品发表后,一些同志认为有些“伤感”,孙犁便把这篇作品“放弃”了。在延安,他利用这篇小说的素材创作了《芦花荡》,使之成为《荷花淀》的姊妹篇。

1962年,《爹娘留下琴和箫》被冉淮舟发现,抄录下来送给孙犁,几经周折,1980年在《新港》第二期重新发表,并易题为《琴和箫》。阅读这篇旧作,孙犁觉得没有什么严重的“伤感”问题,同时觉得作品所流露的情感很是单纯,它所融入的激情,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盈,反映了当时迫切的抗日需求。

在《炮火中的荷花》中嵌入《琴和箫》的内容,通过创造性转化,延伸出爱国知识青年参加抗战这条主线,使之与白洋淀地区的青年农民,尤其是青年妇女参加抗战这条主线并行,也许是一种更好的改编路径。这些青年男女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行为,以及爱情与家庭所汇成的命运交响曲,会赋予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更加曲折的故事情节,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
他生长在北运河畔一个殷实的家庭,家里经营粮铺生意。父亲思想开明,乐善好施,深为乡邻拥戴。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,一心一意相夫教子。他在家排行老三,上面有两个姐姐。父亲为他起名顺平,顾名思义,愿他这一生顺遂平安。

他天资聪颖,安静懂事。十六岁那年,他考入市内一所中学。从土生土长的农村来到城市,他的眼界开阔了,思想也随之进步。成绩突出的他,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,是同学们公认的活跃分子。

那一年,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,举行示威游行,高呼“外争国权、内惩国贼”,要求废除“二十一条”。天津学生支援北京学生,他参加了天津学生联合会,参与组织同学罢课、集会、游行、上街演讲,号召工人罢工和抵制日货。

中学四年毕业,他考入北京一所师范大学。大学毕业后,他选择回到市内的一所中学任教。

又过了几年,他娶妻成家。妻子是他一位要好的同事的妹妹,他俩一见倾心。妻子知书达理,温良贤淑。婚后一年多,他们有了一个乖巧的女儿。

九一八事变后,他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,时常奔走于市内各个大学、中学宣传演讲,唤醒青年人的觉悟。

不久后,他告诉妻子,因工作需要,他被调到家乡的一所小学任教。妻子感到非常意外,但还是很快接受了这个不容改变的事实。数天后,他们收拾好行李,动身前往,在小学校附近的一处民房住下。

一日,家里来了两位穿着长衫的陌生男子,俩人随他进入里间屋子。妻子端茶进去,见他们表情严肃,说话神秘,她便放下茶碗转身离开。后来,妻子得知,他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他白天教书,深夜时分就印刷宣传材料或召集人员开会。那间里屋,成了他们商议要事的地方。为了妻女安全考虑,他决定送她们到自己父母那里居住,而妻子执意留下来陪他。最后,他只好将女儿送了过去。

七七事变爆发后,天津沦陷。驻守在家乡附近的国民党营盘要向南撤离。他和抗日自卫队队员用马车协助部队拉运军火,送到子牙河装船运走,后发现军营内还有一些遗弃的弹药和军用物资,为了不让其落入日本鬼子手里,他又同自卫队队员冒着生命危险,将物资送往正在津西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阵地。

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津北大陆的扫荡。在家乡一带的村落上空,日本鬼子的飞机连日盘旋,炮声、炸弹声不断响起。眼瞅着有的房屋顷刻间倒塌,男女老少哭喊着慌乱逃散,他所任教的小学校被严重摧毁,学校被迫停课。

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,作为一名教师、一名共产党员,他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。他有文化、有思想,做事沉着冷静,很快得到了乡亲们的拥护。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加入

从外地出差一周回来,办公室窗台外的它又长高、长大了,茎枝顶端悄然间结出了多个毛茸茸的果,甚是可爱。

它是谁?它是一株我尚不知道名字的野花,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。说熟悉,是因为半年多来它始终默默地陪着我;说陌生,是因为我并不知它是怎么来到我身边的,更不知它来自哪里。

办公室窗台的花盆里,原本只有几株绿萝,是前年调换办公室时特意买来用于净化空气的。它们的茎叶绿得发亮,貌似吸足了阳光和养分,然后安安静静地趴在花盆的泥土里,过着“衣食无忧”的日子。我习惯在早晨提前到办公室给它们浇点水,指尖触及微凉的土壤时,心里也跟着踏实了几分。这座城市很大很大,只有这方寸花盆里的绿意,是完全属于我的,这便已经足够了。

今年四月一个周末的早上,我如常到单位加班,同事还没到,我蹲在窗边修剪窗台外那盆绿萝的枝叶,倏地发现在绿萝的缝隙里,竟然冒出了一个嫩绿的芽,芽的顶端还沾着未曾脱落的泥土粒。那芽尖细得像绣针,却透着一股倔强的劲儿,顶着晨曦的露水直直向上,仿佛在宣告它的到来。我既惊叹又好奇,惊叹它的性格是如此坚韧,好奇它的“身世”和来历,不知道是昨夜带着丝丝暖意的春风,还是偶然路过的哪只鸟儿把它送来我身边的。

在随后的时间里,它和花盆里的“原住民”绿萝一同成长,只是绿萝依旧那样慢慢悠悠地享受着阳光和我给予的滋润,它却像被施了魔法一般,几天就抽出了火柴棍般粗细的茎,还悄悄展开了两片圆乎乎的叶子,时而像两只拢着的小手掌,怯生生地朝着光的方向,时而像睁着两只好奇的大眼睛,打量着我和窗外的世界。

从那时起,我开始格外留意这株不请自来的小小植物。我怕它渴着,又怕它涝着,就想办法在喝剩的矿泉水瓶的瓶盖上扎几个小孔,每天早上沿盆边浇一圈水,让水量刚好能浸湿表层的土,又不会积在盆底。一旦哪天天气预报夜里要下雨,我就在下班前把花盆往窗内挪挪,怕雨水冲坏它柔嫩的茎;正午太阳烈了,我又会拉上半扇窗帘,给它铺就一片温柔的阴凉。

它就这样恣意地成长,茎秆一天天变粗,叶片层层叠叠地舒展开,竟有些要与旁边的绿萝试比高之势,渐渐成了花盆里最显眼的存在。尽管因它个头还比较小,无法用手机拍照识别出它的名字,却不妨碍我和它的快乐相处。我总会在浇水时和它轻声诉说,说自己每天的快乐和忧愁,说自己的小心事,也时常说起我魂牵梦绕的故乡,那个北方的小村子,秋天尽是满眼绚烂的丰收金色,冬天的白雪把村庄打造成童话的世界……

和挚友不止一次谈起它,这株不知名的“天外来客”,他问我为何对这株野花比对绿萝还上心,我淡然一笑,绿萝毕竟只是买来的景致,而这株野花,是从无到有,完全靠自己挣出一番生机,这就难免让人多了一份怜惜和牵挂。不知不觉中,我早已把这株不起眼的野花,当成了案头不可或缺的伙伴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野花长得越来越精神,在盆里铺就一片绿色。有同事到我办公室,看到花盆里的它,顺口说:“这株野花还是拔了吧,占着地儿,还招虫子。”我连忙摆手:“别碰它,我特意养的。”

为了避免遭受重创和防止地道口暴露,他们选择掩护伤员迅速撤离。

这次突袭虽未成功,但将吊桥炸毁,切断炮楼内的伪军与外部联系的通道,给后续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第二天晌午,十几个日本鬼子突然进村,挨家挨户搜查昨夜突袭炮楼的人员,弄得鸡飞狗跳,并要求每户不准留一人,就连身体不便的老人和几个月大的孩子都要全部到谷场上集合。

他刚刚下地道给受伤的自卫队人员送饭回来,正准备吃饭,“咣”的一声,院门被踢开,几个日本鬼子闯进院子。妻子紧张地朝屋内的衣柜下面望了望。他看了妻子一眼,示意她不要惊慌。院里、屋内被弄得叮当乱响,鬼子们搜了半天,也没有搜到人,气急败坏地离开了。

烈日炎炎,谷场上站满了乡亲。他远远地看到,父母牵着女儿的手,也站在人群中。

鬼子在前面架起两挺机关枪,枪口对着人群。一个汉奸高声喊道:“你们都听好了!谁是共产党、马猴子(抗日自卫队人员),赶快站出来!”

人群中没有人说话。

这时候,老村长站了出来,毫不畏惧地说:“我是村长,我用脑袋担保,我们村没有共产党,没有马猴子。”话音刚落,就听村民中有几个人一起高声喊道:“我们村没有共产党!没有马猴子!”

鬼子头目气势汹汹地冲着人群吼叫,汉奸翻译道:“今天你们要是不交出共产党和马猴子,我们就炮轰整个村子!”

军犬朝着人群狂吠,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。炎炎烈日下,有几个老人坚持不住倒在地上,人群中有些骚动。鬼子头目举起手枪,朝天空开了两枪,人群安静下来。

鬼子头目朝一个鬼子使了个眼色,只见那个鬼子立即跑到人群里,抓出一个男子问:“共产党和自卫队的人,被你们藏到哪里去了?”

“我说了——没有!”

鬼子头目掏出手枪,朝男子的胸部开了一枪。人群中发出惊叫声。

男子重重地趴在地上,鲜血从他的胸部流了出来,瞬间漫开。

“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!”只见他从人群中走了出来,转身望了一眼身后的乡亲们,对鬼子说:“他们都是种地的老百姓,什么都不知道,放他们回家。”

鬼子头目一摆手,汉奸立马向人群喊道:“解散!”